

鎮江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镇江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三月

冷御秋先生在延安（1945年7月1日—7月5日）

（详见本《辑》中《冷御秋先生生平事略》一文第六节）



此图由左至右：毛泽东、刘少奇、冷御秋、黄炎培



此图由左至右：褚辅成、冷御秋、黄炎培、陈毅

AWT1 / 16/10/11

目 录

封面题签·····	周汝昌
“把革命红旗牢插在圖山宝塔上”	
——记战斗在敌人心脏区里的江边交通站	
·····	朱一鸣 (1)
在日伪镇江西火车站里的战斗(一九四三——一九四五)	
·····	王永林 (8)
航轮飞渡江南北——记镇江商会迎接解放军过江	
·····	蒋志云 (24)
漫谈恒顺酱醋厂·····	任玉祥 明 光 (26)
陆小波先生与镇江商会·····	(30)
冷御秋先生生平事略·····	李守静 (33)
青囊济世话洪溪——记延续十世的中医大港沙氏	
·····	张志清 金维藩 (54)
关于一九三五年刺汪案见闻回忆(续完)·····	卢佛慧 (59)
镇江名胜诗抄选录(转载)·····	邓拓遗著 (73)
镇江市内马路小考·····	杨方益 (76)
镇江京口闸(大闸)的古今变迁·····	刘雨男 许 江 (86)

江天作先著今昔修建实录……………戴志恭 (92)

先君李竟成事迹概述……………李 明 (97)

我的叔叔陶骏保……………陶天申 (105)

镇江辛亥 (一九一一) 年前后创办的工厂 (一览表)

……………智 仙 (123)

人物表

李 明……………

陶天申……………

智 仙……………

附录

李 明……………

陶天申……………

智 仙……………

李 明……………

陶天申……………

智 仙……………

李 明……………

陶天申……………

智 仙……………

李 明……………

陶天申……………

智 仙……………

“把革命红旗牢插在圖山宝塔上”

——记战斗在敌人心脏区里的江边交通站

· 朱 一 鸣 ·

“长江波浪滚滚向东流，
敌后交通南北永不断”。

一、留下来，坚持敌后战斗

1945年十月份，我苏南地区新四军和地方革命干部，按照党中央“北撤”指示，向苏北撤去。临撤走前，山北县县委书记程中、县长赵文豹、县委组织部长周忠三同志，召开了我们奉派留下来、在沿长江边二十多里长的它山区坚持斗争几个同志的会议。说明了北撤的原因和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重要意义，并指出我们的任务：一是继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地方各界革命进步人士，对反动派进行斗争；二是组织好江边水上交通工作，保持好苏南、苏北党的联系。最后，赵文豹同志叮嘱说：“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同志们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就是牺牲到剩下一个人，也要把革命红旗插在圖山宝塔上，将革命斗争坚持到解放苏南为止（按：此山，是大港以东、长江边上的一座大山，上面有

古塔，至今尚存——笔者）！”我们知道：这就是意味着要求既有不怕牺牲、战斗到底的决心；又要发挥高度的机智勇敢能力。大家都牢记了。

当时我担任本山区党的领导工作。大军北撤后，我们少数人，留在敌人心脏里斗争，要完成党交付的两项任务，确实是极端复杂、艰巨的，每个人都随时有牺牲生命的危险。可是，由于紧紧依靠了党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在从1945年十月到49年四月的三年多时间中，我们克服了难以数计的艰难危困，逐步扩大了党的组织，在本地区先后发展了新党员二十四名；组织了秘密武装队员四十余人；发动群众，向敌人抗丁（即反抗强征壮丁）、抗捐、抗税若干次，打击了极为反动的蒋伪人员二十余名……，总的说来，还能算为党、为人民做了一定工作。这里，只着重谈一下我们是如何完成第二项任务，做好组织和确保水上交通工作的。

二、三种水上交通站

跟着我军北撤，蒋伪政权进占苏南这种形势急剧变化的需要，对我长江水上交通组织加强领导和进行调整，其时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原有的交通站，当时，有的已被敌人破坏掉，有的也已不能再起原来作用了。我们就重新建立了四个三种形式的地下交通组织，来确保完成大江南北的联系任务。

第一种是秘密的，绝对可靠的交通站（一个）：这种秘密的站，是不能轻易地去使用它的。只有遇到重要的负责同志过江时，才让它发挥作用。因此，平时既要绝对不能暴露

它，又要十分加以保护它。1948年上半年，我镇江地区工委书记陈云阁同志过江去苏北汇报工作，就是由这个站的文必才同志（大路人）护送过去的。

第二种是“合法”的交通站（二个）：让我们同志伪装成“商人”身份，通常是由江南贩运香烟往江北，从江北贩带食盐和迷信用品敬神、祭祖烧的香回江南，以这种“跑买卖”的方式，来往两头传递“情况”。每当我们 将江南的“情况”向江北领导汇报时，就把到手的、需要上报的材料，写成小字纸条封藏在香烟内带过去；江北也如法泡制，把那边的“情况”写夹在敬神佛烧的香里封好，带来江南。就这样，保持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一直不断。遇有重要的“情况”，如江北我军“七战七捷”的胜利消息、淮海大战役的捷报等等，经由“交通（员）”带来后，我们一接到，都是马上赶印成宣传品，向党内外群众及敌伪人员散发，及时起到了很大的鼓舞群众革命斗志及瓦解、涣散敌方人员思想作用。这种“合法”的交通站，是由大路镇的冷其邦同志和大港镇的袁寿保等同志负责的。

等三种，似乎可称为特殊的交通站，是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关系人员来进行的（一个）：这是只有在十分必要而又确实无法完成某项紧急任务时才能让它发挥作用的（看了下节的举例就可明白）。

现在，就让我忆述一个事例，来说明当日我们究竟是如何搜探敌情，充分发挥后两种水上交通站的作用，得以胜利完成对敌斗争任务的。

三、长江天险成虚话，革命交通任自如

1949年春季，集中江北的我方大军积极进行渡江准备工作。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迅速将苏南长江沿线的敌人“江防”情况了解清楚。

为此，3月上旬，江北廿军军部首长和军部参谋颜诚同志，特地派出了四位侦察同志化装商贩，来到了苏南地区。

派来我山区的一位某侦察连指导员，是随“合法”交通大路镇冷其邦同志贩卖食盐的商船过江来的。任务是要我负责协助他将苏南从姚桥到谏壁沿江二十多里长线上十八个敌人据点和碉堡里驻防敌军的番号、人数、武器装备及思想“情况”掌握到手。怎样才能迅速掌握到这些“情况”呢？——我们立即行动起来，通过了以下三种方法：（一）是让这位侦察连指导员化装成蒋伪基层人员，也挂上伪乡、保长的狗头牌子，密令“两面派”的伪乡、保长和他“配合”，买了烟、酒、鱼、肉等物，深入到敌据点、碉堡里进行“慰劳”，和敌人驻军一起吃喝，边吃边谈天，乘机不时到阵地看看玩玩。因这班家伙（指敌军人员——笔者）本无斗志，自然也谈不上有啥“警惕性”，只要有吃、有喝、有礼物拿，就昏昏然了，从而，也就大大有利于我们多了解到若干实际“情况”。（二）是依靠敌军据点周围的党员和群众，与敌人加紧日常来往，找机会进行活动，了解“情况”。（三）是布置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掌握“情况”。再把这三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汇综加以分析判断。就这样，前后经过二十天左右周密的、机动、灵活的侦察活动，算是把沿江“防

线”的敌情，搞得一清二楚。大家无比欢喜，马上安排送指导员过江，万想不到就在关键时刻，又发生了新的突然变故。

意外消息传来，敌方下令将长江封锁了，滚滚大江里只有敌人兵舰、汽艇可以巡查、来往，任何民船一律不准通行。——我们这位指导员虽然全部掌握到了敌人在这段长江沿线“防务情况”，可是，再也过不去长江了！

大家都记得：这位指导员一来时就讲说，这趟他过江来的任务“很急，很重要”，“这是为大军渡江南下做好准备的重要工作”，他虽没有（也不可能，不允许）说明大军渡江的确实月份、日期，但，我们一听就都知道：时间不会太迟了，听到这番话，大家多么高兴啊！“新四军早日渡江南下，解放苏南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在江南敌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和广大群众如何日日夜夜盼望和迫切要求实现的心愿啊！为此，我们全体同志集中精力，用尽心血，经过周密慎重地考虑，多方设法，冒受“风险”，好不容易总算完成了这一急要的侦察任务。可是，再也没预料到，反动派会突然封锁长江，使南北江面交通断绝，往下一想，如果不能让这位指导员把这份急要材料及时送回苏北，岂不辜负了军首长的重托和更要耽误了革命的大事吗？！那一来，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贻误军机”，我们是会得到应有罪责的，想到这里，真是急死了！同时，也更加增添了大家对反动派的切齿痛恨！

“天无绝人之路”，终于冷静下来，大家经过集体研究分析，别无他法了，只有利用第三种特殊的交通站，决定发挥一次打入敌人内部的我方关系人员的作用吧！

于是，在分秒必争的时间内，我迅速派人把“关系人”大港伪镇长赵维吉找来，由我出面恳谈说：“我有个至亲在苏北开店，现时在江南，因封江过不去，由于眼下江北形势紧张，他急赶回去搬家，结束店务，一定要设法即日送他回去！”要求赵必须完成这一任务。

赵维吉同志经过思考，一口承应了。但提出“要化些钱收买敌人兵舰上的人员来护送过去，才能保险”！

我问：“要多少钱？”

赵说：“由于现时敌人军心严重涣散，抱有等机会开小差（逃跑）思想的人很多，所以他们不要国民党发行的‘法币’，而只要银元和黄金。如能有三十到五十个银元和三、四两金子，事情就好办了！”

我随即应允“照给”，但严肃地向赵指出：要他尽心负责，保证一定要把人安然无恙地送到苏北。否则，要与他算“责任帐”的！

“交易”办妥，果然，在三天后，我们这位连指导员平平安安地回到了苏北二十军军部。——消息传来，我们几个同志的心情，真是既高兴又愉快得没法形容出来。当时大家还总结了四句话来嘲笑敌人吹牛狂言的破产，现在虽隔多年，我还能背得出来，那四句话是：“敌以长江为天险，妄图切断南北线，任他手法多毒险，我军来往照自如！”记得当时又编了一首歌曲来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胜利和鼓舞同志们的斗志。歌词是：“春天的太阳放彩光，胜利的歌声响四方！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坚持斗争敌后方！不怕千难和万险，不惧前门有虎后有狼！坚决斗争到解放，革命的红旗牢插在此山的宝塔上！”

四、鱼儿离不开水，党离不开人民

为什么我们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尽管我和所有同志们做了点工作，但主要靠党的正确领导和敌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当时由于我军北撤，白区形势特别险恶。尤其是1947—1948两年中，反动派为了“巩固”和“确保”其“政权中心地域”，对苏南地区所谓“江南土共”的“清剿”工作，进行得更加疯狂。捕人杀人极为残酷、狠毒，单谈我们在本山区留下前后坚持斗争的十一位同志中，就壮烈牺牲了王世民、倪东川、马正贵、赵鸟根、何邦富等五位，仅余有朱松华、聂老虎、赵金荣、董瑞良、颜诚（后去苏北）和我六人。但也因此，与反动派主观愿望相反地更大地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与群众激情，敌人血腥屠杀的结果是：只能造成更广泛更众多的人民群众同情、拥护支持我们。受苦受难的人民日夕巴望我党我军早日打回江南解放他们，因而，千方百计在明暗中帮助我们开展斗争工作，甚至不惜为此献出身家性命。加上主要有党的正确领导在不断指引着我们的前进方向，也正因此，故而尽管蒋介石反动派在他接近死亡阶段愈加阴险、残忍、用尽惨无人道的“打击”手段来对付我们，可是，我们毕竟坚持下来了。在这斗争极端艰苦的三年多里，我们不但始终把革命红旗牢牢插在昆山的宝塔上（即坚持住了原地斗争，冲风破浪，做好了党交给的工作任务）而且还进一步为党日后解放江南、全中国的需要，储备和输送了一批干部力量。记得当时我们曾经先后秘密输送了积极分

子及军工烈属子女共二十八名到苏北去培训，部份保证了我党解放江南建立新政权过程中有得力干部使用，这一切都是通过了组织和确保江边水上交通站来顺利进行的。今天回忆总结，都全是靠了党的领导和包括各方进步人士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支持，使我们真实体会到：我们是“鱼”，群众是“水”，当年，“鱼水相连”的感情又是多么的深厚啊——要做好革命工作，必须坚持关心、爱护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切切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革命工作的重要问题，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个人和同志们牢记不忘的真理。

在日伪镇江西火车站里的战斗

(1943—1945)

• 王永林口述 • 韩申记录整理 •

一、到鬼子占领区里的镇江火车站做工

我叫王永林，丹徒黄墟人。今年（按：1981）62岁，是镇江铁路站退休工人。

我家系贫农，小时候，家境贫苦不堪，父亲早亡，仅有寡母。从小讨过饭。十二岁替人家放牛。十五岁时，得到本

乡人冷御秋先生同情照顾，引带我镇江城里伯先公园当花匠，后又在园内的大华饭店做伙计。本没念过书，在冷先生指教下，自学几年，有了点文化，能读书报和写一手还算方正的字。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侵华，全民抗日战争发生。冷先生全家去后方（重庆），我失业逃兵荒，先被国民党败兵抓夫搬抬东西到江北，后跑回家乡。日本鬼子占领了镇江城，以后又扶植起汉奸汪精卫伪政府与“和平军”（伪军），逐步侵占了四乡镇集。我回乡，先参加黄墟镇上商民自动组织的保卫队。1939年参加了地方革命工作，后来，黄墟镇驻上了鬼子和伪军，我们仍然在乡间坚持跟新四军抗日，打鬼子。曾被党派去江阴，台北（我军在江北新设县）等县乡间我军地区做收税工作。因受“扫荡”，回来，在当地收税。又由于“人眼太熟”，受到镇上的敌伪严密注意和经常来家骚扰，加上正碰上镇江鬼子开始大“清乡”，一时在乡间无法立足，更不能“露面”开展工作，找同乡友人李金棠想办法。李的姊丈王庆林，常来黄墟岳父家，因而也和我熟识，当时，镇江城内鬼子军管下日本商人承办的“华中铁道株式会社”（华中铁路公司）正在招工，王李二人已先早进铁路做工了，通过王庆林给车站上负责的鬼子送了份厚礼，得其同意，遂引带我上城，到铁路总站（今西火车站）上做工。

记得是在1943年刚过春节后，我那年虚龄二十五岁，开始进镇江铁路站当工人。——事先，我曾向本乡我方乡长吴顺康、区长朱毅（后牺牲）同志汇报请示“能不能进城去干”？朱毅同志说：“你去干吧！到了敌人那边，可以更好地为我们多做些工作嘛！”因此，我才放下心进城。

我虽和王、李两人同在总站上干活，但“工种”却并不一样：王庆林在站长室内，当抄号员（现在叫技术办事员），李金棠干货房（行李房）我在车上当连接员（吊车工），这活儿难度大，危险性高，不少人因此致残以至丧了命，我也曾在连接两节车厢，时被撞震得由这节车端翻跌到那节车上去，幸未伤废。总算掌握了业务，不久就成为熟练工人。同事中国工人当中，只有王李两人知道我和新四军“有关系”，他俩不是党员，但由于是同乡、好友，一直同情支持和协助我。以后，王庆林也和我一样地为党做了不少重要工作（见下）。李金棠因胆小，害怕，始终没敢“插手”，不过，也参加过几次活动（下乡、开会），仍然是我和王的一项可靠支持力量。因为他俩也有抗日救国、保乡、爱民的共同意愿。其他工人都不知道。尽管日子一长，不少人看“动静”，心里是“有数”的。由于大家都是中国人，遇事都能齐心出力，相互帮扶，只瞒着少数车站上的鬼子职工、宪兵和极少数的几个铁杆汉奸。

王庆林，今年（按：1981）64岁，也已退休（现住新丰老车站宿舍）。当时家住在离大火车站（总站，今西站）不远的牛皮坡22号（旧门碑下同）。李金棠（现已去世）和他在一个门里（住在前一进屋）。在他俩帮助下，进城做工后，我就也把家从乡里搬来镇江，就住在他俩对门的31号。因只有一间房子，很窄小，远不如庆林家宽敞，故而，以后乡里我方人来往住息，多是在他那边。当然，有时也到我这边来，实际上，当时我们两家相处得完全同一家人一样，是不分彼此的。

（原载《炎黄春秋》1981年第10期）

二、一个小小的城区革命地下工作点

我到铁路上做工不太久（家已搬进城了。具体年月实已记不清），某天，吴顺康同志来我家，带来紧接通知说：“董参谋长（必成）带信，叫你就回去（按：指黄墟乡间）一下。任务是：赶紧把调查、画好了镇江城里所有鬼子、伪军驻防、岗哨等据点分布和要害区地图带回去？切切不能走风、误事！”我准备好了图后，就约同王、李二人，一起身穿铁路员工制服，大摇大摆地下乡到了黄墟。后，由吴顺康带领，四个人离开黄墟到了后山村，爬到村后的一座大山顶上，见到了董参谋长，当时，还有汪云龙（永胜）同志在场。见面后，我把地图交上，二位首长同志看了图，很满意。慰勉了我们几句话后，董参谋长说：“今后可能要派两位同志进城，帮助工作，望你们当心保护，协力完成任务！”我当然满口答应。临走时董参谋长还叮嘱：“下次如通知你来联系时，切不可穿铁路制服，目标太大！要换便衣（按：即老百姓的服装）来。”

后来，党就陆续派了叶敏（即朱一鸣同志，那时我们不知他的本名，一直根据他的自我介绍，叫他叶敏同志）和陈广两位同志进城，到我们家来了。——记得陈广同志是先来的。叶敏同志是1944年底来的。现在回忆起来，他俩当时的分工是：叶敏同志负责领导往来联系，布置、安排工作；陈广同志常川驻城，负责搜集“情况”及时汇报和接受任务，都由我们负责掩护，保障安全（当然，这只是现在的分析、认识，那时是不管这些事的）。

从此，大体是1944年到1945年八月鬼子投降时止，王庆林和我的家，实际成为我军城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联络、活动点，成为叶敏同志（和其他派来同志）经常来城工作时可靠落脚场所，并掩护陈广同志驻城做好“侦察敌情”工作。——那时候，陈广同志长住城里约有头、两年。记得他是由吴顺康带来的，丹徒大路入。“陈广”是否系他的本名？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老陈”。因为王庆林家屋大，又是老住户，所以都是住在他家的，尽管有时也到我这边来。我记得一上城他曾打扮过一个做小生意的，每天一早就拐着花生（或是烧饼油条）篮子，出门“串卖”，实际是做侦察敌伪动态工作（据王庆林说，他没做过小生意，一上来住在他家，到处跑跑看看。我和一鸣同志记得他是做过的）。反正没几天，王庆林就把他介绍到大站工务段做养路员，是临时工，按“天”计结工资，少做多做都较自如。如他要下乡去汇报、领任务，只要向领班说一声“今天家里有事，不来上班”就行了，不象我们正式工那样麻烦，不能自由。那时牛皮坡、西大院一带，因邻近大火车站和铁路要害区，敌伪戒备森严。我们两家周围、左右邻居，几乎全是当日鼎鼎“有名”的帮会头子，其时已做了大汉奸的鲍海珊手下的徒子法孙，也就是日伪特务、密探人员。他们见我们家突然来了个“生人”，长住不走，从此东乡来人三日两头，进出不断。说是“做临时小工的”，但看看吃用“手面”又不象，起了疑心，就来借故盘查，究问来人（陈广同志）的“底细”。我随便又很自然地说：“是位同乡亲戚，在乡里开小店。他原是位小开（小老闆），家里有两文，本不愁吃喝，不是做小工的人。因鬼子大搞‘扫荡’，不断下乡捣蛋，找麻烦，在